

基于老年休闲旅游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

陈元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3)

[摘要] 本文通过相关老年旅游决策类文献研究,结合养老机构管理者、高校相关专业教师、资深业内人士访谈发现,老年人休闲旅游研究对老年旅游发展及未来养老产业消费升级起到积极关键作用,并对老年人休闲旅游决定性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通过医疗护理以及老年心理学视角发现,除常见旅游影响因素外老年人心理抑郁以及隔代子女照顾是抑制老年人休闲旅游的两大重要因素,子女对于老年人日常居家抚养态度对老年人休闲旅游决策产生影响。

[关键词] 老年休闲旅游; 护理; 隔代照料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10.2070

一、研究意义

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2亿,占到总人口的15%以上,超过了联合国老龄化人口占比10%这一指标,预计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净增加2.44亿,规模将扩大1.15倍(原新,2013)。与早期欧美国家相同,我国也已迈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数量庞大,增长迅速,而市场以及强大的购买力通常建立在人口统计学基础上(Nimrod, 2008),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了巨大的老年消费市场。同时,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观念改变,当代老年人更注重精神追求和生活质量提高,旅游作为现代老年人群丰富生活和健康养老的一种理想方式,也成为旅游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部分地区老年消费者的月收入平均高于其子女人均月收入,这也说明我国银色市场的潜在购买力比中青年人市场的购买力还大。因此,老年休闲旅游作为老年人退休后主要日常休闲活动,必将起到直接切合民生的重要消费增长点之一。研究了解我国特有的老年人休闲旅游影响因素,会对老年旅游发展及未来养老产业消费升级起到积极关键的作用。

二、我国老年休闲旅游人群的特点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由东向西的区域梯次特征,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同时,由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费用由国家承担,老年医疗护理已不再是绝大部分城镇老年人群老年生活的主要矛盾。发达地区老年人口呈现出比例高、消费潜力大的休闲养老特点,部分发达地区已经进入全面休闲养老时代。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养老具有一定独特性。受到传统“养儿防老”观念的影响,相比欧美国家,我国老年人对子女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我国2000-2010年平均家庭户规模由3.44降为3.10(王丽,2016),随着子女数量减少,传统的多子多福演变成了独生子女为主体的新简约化家庭模式,加上子女日常生活及工作压力增加,未来老年人与子女养老冲突尖锐化程度也将远超当下,因此家庭结构的改变会导致老年休闲养老旅游不确定性。同时子女状况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趋向多元,代际之间的支持方向和强度差异显著,且当今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也重铸了老年人对子女的角色期待和互动模式。随着近几十年来我国对养老保险金涨幅力度不断加大,攒钱防老的传统观念也在慢慢淡化,从而改变传统老年人群体休闲养老行为。尽管我国有良好的老年休闲旅游发展潜力,但在漫长的老年生活中,子女对老人

日常照料、心理疏导以及态度也会直接影响老年人日常休闲生活质量,也会影响老年人群体休闲旅游。

三、老年人旅游决策影响因素综述

探究老年旅游影响因素包括生理、心理、社会、精神等多元内涵,例如老年旅游动机研究(Sellick 2004);也有关注于影响老年人旅游的直接因素研究(e.g., Bai, Jang, Cai and O'Leary 2001);同样老年个体出游后对健康状况或身体损耗的影响同样被提及(Hong, Kim and Lee 1999)。而老年旅游本身受生命历程影响,既极具个体多样性,又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和代际特征,其相关旅游研究应当涉及老年人成长的社会文化框架,是基于一生的兴趣爱好、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制度环境等而形成的综合研究(黄璜,2013)。

老年旅游存在几点制约因素。大多数退休人员倾向于选择做自己的休闲爱好,特别是旅游(Harvard Center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 2004),但之后随着退休之后精力、体力、财力、人际都在逐年下降以及失去好友和家人都会导致户外旅游的减少。而享受社会保障、具有良好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心理健康状况的老年人,休闲生活频率更高,高质量的休闲生活能显著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延长健康预期寿命,良好的健康状况也能显著提升老年人休闲生活频率,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系统(王丽,原新,2016)。现有的研究中老年旅游主要以自主休闲时间,经济保障,兴趣爱好,人际关系,周边配套,居住环境,受教育水平,婚姻,身心健康等方面为影响旅游决策的主要因素。

四、代际与隔代代际对老年人旅游决策的影响

尽管我国有着上述对于老年休闲旅游决策因素的研究,但子女日常照料行为对老年人休闲旅游动机的影响,即老年休闲心理方面、代际照料、隔代照料以及临床医学与老年人休闲活动关系的文献相对较少。在根据社会交换理论的假设中,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会尽力遵循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老年人与成年子女之间的社会支持即亲子支持是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它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密切相关(Lee, 1995)。理论上老年人给予和获得子女支持的整体水平应该是一致的。而当老年人对于子女是否提供养老、日常生活照料等孝顺行为与期待不一致时,会导致老人产生不同抑郁情绪(Ellison, 1990)。

在代际照料方面,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当老人给予子

表 1 影响我国老年人休闲旅游决策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	经济影响因素	健康及心理状况	健康稳定的社会关系	居住地养老服务水平	老年人对子女工作的影响	自主决定权不够	居住环境因素
老年休闲旅游决策影响因素探究	消费水平	慢性疾病	兴趣爱好	医疗	身体状况	可支配休闲时间	气候条件
	投资收益	失能型	社会关系	旅游文化	自身心态	对旅游恐慌感	独居
	可支配收入（养老金+子女赡养）	老年虚弱性	人生态度	子女对老年生活认知	生活方式，节奏	经济自主权	传统式子女照料
	隔代子女赡养费用	抑郁偏执型	自我拓展	子女对老年人认可度	作息规律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	养老院
	生活成本		家庭关系		隔代照料	家庭地位	子女经济困难

女一定的支持后，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们会有一种不平衡感，因而会产生抑郁；而当老人只能给予子女较少的支持和帮助，却得到对方相对较多的回馈时，他们也会感到不安，从而抑郁水平也会相对较高（尹述飞，彭华茂，佟雁，2012）。也就是说与老人给予和接受支持水平不一致时，老人的满意度会更低，从而可能更加抑郁，以及偏执几率从而降低老年满意度，降低休闲旅游频率。同样在隔代际照料上，根据代际互惠理论（孙鹃娟，张航空，2013），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行为也是换取成年子女支持的重要途径一。

在隔代照料方面，如果社会支持是发生在关系亲密的或关系长久维持的个体间，那么支持接受者就不必即时的给予支持给予者同等价值性的回报（尹述飞，彭华茂，佟雁，2012）。例如美国老年人为儿童提供无偿的照料服务每年创造的经济价值保守估计达390亿美元；英国的1400万祖父母每年无偿提供价值39亿英镑的幼托服务（孙鹃娟，张航空，2013）。即使他们现在接受和给予孙子女的支持不一致，也不会觉得更加抑郁。这也意味着，隔代子女照料从理论上不会因为抑郁导致老年人休闲旅游频率减少，但可能由于对子女以及隔代子女经济支持，导致休闲旅游频率减少。同样，与没有照顾孙子女的老人相比，照顾孙子女的老人身体健康状况更差，在躯体活动方面受更多限制，且代际支持加大老年虚弱度，减少休闲旅游（吴敏，2011）。

五、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文献回顾、现场考查、访谈的定性研究方法。现场考查的主要人群为各大养老护理机构负责人、老年专业高校专家、老年旅游类企业资深人士。访谈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红磡养老、中大国安、百乐时光等企业高管的演讲或大会组织访谈，在记录后进行了分析，并采用了与本研究相关的资料、另一部分是选择了浙江大学旅游学院、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等高校专家以及资深养老旅居人士进行了半封闭式访谈，主要是通过电话及邮件的方式来开展。在文献回顾方面，本研究尝试通过在老年休闲旅游决定因素中回顾以往学者对的研究，并依据社会交换理论，代际交换理论、老年护理以及心理等以期寻找新的影响我国老年休闲旅游决策因素。

六、结果与发现

研究根据上述文献内容，并结合现场考查、访谈，调研最终发现，老年旅游的决定性因素以经济影响因素、健康及心理状况、稳健的社会关系、居住地养老服务水平、老年人对子女工作的影响、自主休闲决定权以及居住环境因素七维度构成（如表一所示）。其中，研究将涉及到老年人身心护

理即临床医学类因素对休闲旅游的影响列入到研究中，并确定健康及心理状况以及老年人对子女工作的影响为关键性决策维度。在健康及心理状况中，偏执型老年人会直接影响休闲旅游频率。而老年人隔代照料无论从经济、休闲时间以及老年虚弱度等方面起到抑制式抑制作用。而根据隔代交换理论，由于不满子女日常照顾疏忽以及交换落差老年人会尝试选择养老机构进行心理慰藉，从而大大降低老年人的可支配收入，抑制旅游。

老年休闲旅游决策中老年人会为了隔代子女照顾放弃休闲旅游事件以及金钱。目的在于降低子女生活压力，而并未从中互利，因此在老年休闲与隔代照料中老人更多选择后者，从而违背代际交换理论。所以老人和孙子女之间的交往和沟通不能仅仅用一种互利互惠的利益关系来解释，他们之间的交往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隔代爱的传递，不求回报。而从动机角度看，老年旅游外部动机中最直接的两大影响因素为心理健康以及隔代照料。因此，子女对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对于老年休闲旅游决策中起到主导作用。本研究在对老年休闲旅游决策量表开发中，对日常护理，子女及隔代子女影响等外界决策进行添加也具备理论依据，理论上为今后研究我国老年休闲旅游决策起到一定指导性作用。

通过上述结论，建议在未来家庭类旅游市场中适当添加老年类产品，即亲子加老年类产品，从而增加老年人家庭存在感。同时大力提倡减少隔代抚养，增加老年自主休闲出行频率。子女应定期了解老年护理知识，了解老年人需求，增加与父母有效沟通时间，在心理上给与老人最大程度慰藉。

参考文献

[1]黄璞. 国外养老旅游研究进展与我国借鉴[J]. 旅游科学, 2013 (6): 13-24.
 [2]孙鹃娟, 张航空. 中国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与经济, 2013 (04): 70-77.
 [3]孙鹃娟. 成年子女外出状况及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J]. 人口学刊, 2010 (1).
 [4]吴敏, 李士雪. 畅济南市65岁以上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研究[J]. 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1 (01).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2019年度一般科研项目，新时代背景下的积极老龄化体系建设研究（编号：Y201941955）。

作者简介：

陈元（1988—），男，北京市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积极老龄化，老年旅游，高等教育。